



踏上革命的征途

TASHANG GEMING DE ZHENG TU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这是一本革命斗争回忆录。

本书的前八篇文章記載了紅軍在革命初期的英勇斗争事迹，其中有四篇是回忆紅軍在长征中以坚定的革命意志经历了荒无人烟的草地，渡过了大渡河以及在突破天险腊子口前夕所走过的荒僻险峻的道路，紅軍在那困难的环境里，边行軍边作战，重重地打击了敌人；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四篇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軍英勇斗争的事迹，其中二篇是写敌后根据地的武装部队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坚决消灭敌人的故事；一篇是记录淮海战役中我軍歼灭黄伯韜部队的实况，还有一篇是写一家人的在旧社会中妻离子散，而在革命队伍中得到团圆的曲折经历。

看过这几篇生动、感人的回忆文章，可以使我們更进一步体会到今天胜利的来之不易，那些革命战士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激励着我們每一个人更好地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去！

目 录

踏上革命的征途	张新华 (1)
草地上见到毛主席	刘 昆 (12)
威震敌胆	秦化龙 (15)
——亿足智多謀的徐彥刚司令員	
大渡河边抓“舌头”	张新华 (27)
“路”	张新华 (32)
三双牛皮革鞋	潘 平 (38)
“铁釘”九連	周純麟 (43)
到陕北去	周明国 (54)
智取虎北	王 展 (61)
双乳山伏击战	张 鵬 (68)
全歼黃伯韜兵团	武鳴亭 (74)
家	王良亭 (83)

踏上革命的征途

張 新 華

我出生在福建省宁化县一个貧苦的农家，父亲和母亲都是勤勞的农民，終年給地主耕种，但总是不得温飽。

在我小时候，家里有一片竹山，山上长滿了碧綠碧綠的又粗又高的竹子，还有两人也抱不攏的杉木和一棵棵枝叶繁茂的茶树。山上的收入是維持家里生活的主要来源，这片竹山成了我家的命根子。

九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一躺就是几个月，为了給父亲治病，母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典卖光了，可是病还是不見起色。那时，我們那里的高利貸剝削是极其厉害的，借一块白洋过一个月就要还两块，一石谷子过一年就要加五加六。我們明知道借錢就等于招住自己的喉嚨，但是总不能眼巴巴的看着父亲病死啊！没办法，母亲就向地主曹国志借了十一块钱，当时規定三个月以后还清，地主怕光是口說沒有根据，就要我們將竹山作为抵押。不久，父亲死了，旧債还不起，新債又来了。从此，命根子的竹山，就再也不是我們的了！

家里实在穷得没有办法，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只得暂时并入堂叔家过活。

我一年年长大了，母子二人觉得待在旁人家里总有許多不便，于是就在我十五岁的那年与叔叔分开了。我們又搬到了自己那間有小楼的木屋里住下。屋子年代久了，四周的木板墙破烂得直透风，夜里連灯火也点不住；几张瓦片象剝落的魚鱗，东零西散的盖在屋頂上；白天，太阳光从屋頂直射到屋里来，夜晚，躺在床上，可以望見天空中一閃一閃的星星，一到下雨天就漏得連个藏身的地方也沒有。

我們向地主租种了一点土地，母亲和我就白天黑夜的在地里干活。母亲是穷苦人家的女儿，是个劳动能手，除了冬天，差不多終年赤着脚。她粗細农活都能干：掌犁、下种、挑粪、鋤地，样样都行，賽过一般的男人。我除了帮助母亲劳动之外，还經常出去給地主家打短工。

为了糊口，我們也經常給米販担米。那时，母亲总是天不亮就叫我起床，她将路上吃的飯装在一个用粗布縫成的小袋里。我們拿着扁担，跑到离村十里的曹坊，各人挑上一担米，再走向四十五里外的山下口去，来回要走一百多里路。每担掙上二毛錢。途中肚子餓了，就在路旁一坐，舀来一碗凉水，一面咕嘟咕嘟喝上几口，一面把冷飯团一个个往嘴里填，有时，弄得好向人家要到一碗开

水，母子俩推来让去，最后，还是我喝够了，母亲才沾上一两口。每次担米回来，因为过度的劳累，母亲总是浑身筋骨酸痛，夜晚睡在床上象躺在钉板上一样的翻来复去睡不着。但是，为了挣上几毛钱，第二天她还是要和我一道去担。

1931年，我十岁了。这年冬天，红十二军来到了我们的家乡宁化、长汀一带，而且有一部分部队就驻在离我们村十里地的曹坊。村上那些平日在穷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地主老财们，一听说红军来了，早夹着尾巴逃得无影无踪了。那时，红军每到一处地方，只要一休息，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写标语、发传单、召集大家开会等。

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红军宣传队的同志下来了，他们由村东头慢慢向西走来，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声喊道：“老乡们，开会啦！开会啦！”后面跟着一大群村上的男女老少。我看着大家闹闹嚷嚷的那股高兴劲，不由得把锄头朝地里一扔，也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了。我们来到村南头的大祠堂里，嗨！那里比每年元宵节时做戏还热闹。广场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东一堆西一簇的，每一簇人中间都围着一个宣传队员。搭得高高的戏台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我一天学也没上，所以一个字也不识。戏台的周围，象店铺一样挂满了从地主老财们家

里沒收来的皮袍、綢袄、被子和其一些七七八八的輕巧的家具杂物。几个紅軍战士持着枪非常精神的站在台上。广场的中央是一堆堆的粮食、农具和一口口杀好了的皮白肉紅的肥猪，許多嘰嘰嘎嘎的鷄鴨也圈在一旁。……

不一会，台上走出了一个小約廿来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穿一身整整齐齐的灰軍装，腰皮带上別着一支装在皮套里的短枪，套口上還露出一截鮮紅的綢子。从他的外表看，大概是宣传队的一位負責干部。他站到台中，兩手向大家摆了摆，鬧哄哄的广场上頓時靜了下来。

“乡亲们，現在我們开会囉！今天的大会是要把沒收来的地主豪紳的财产，分給貧苦的农民……我們紅軍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穷人求解放的……”他的声音越讲越高，兩只手不时的在空中摆动。这时，会场上鴉鵲无声，人們都睜大眼睛全神貫注的听他讲着，好多人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了。

我听着他讲，覺得句句話都很新鮮，越听越覺得有道理，一句一句直往脑子里钻。的确，我們一年忙到头，辛辛苦苦的，还是吃不飽穿不暖。可地主呢？成年不劳动，吃得肥头胖脑的，还騎在我們头上作威作福。我过去总認為穷人是命里注定穷的，就不知道是地主豪紳們剝削穷的。想想他的讲话，我一下明白了：原来我們是这样才穷的啊！我第一次懂得了压迫和剝削这个字眼。

散会了，人們都拿着另到的东西，挑的、抬的、背的，提的，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但我却舍不得离开这个会场，直楞楞的站在那里，对着那高高的戏台、紅紅綠綠的标語和那些总是堆着笑容、說起话来头头是道、此时还在場上忙忙碌碌的宣传队员們出神。

突然，有两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回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台上讲话的那个同志。

“老乡，刚才讲的话你听得懂嗎？”他笑嘻嘻的望着我。

“能懂，能懂！你刚才讲的真好，道理都对。”我一面說一面連連点头。

他听了我的回答，朝我身上穿的补丁遮补丁的衣服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問道：“你家住在哪里？”

我用手向北指着山坡下的那間小木房子說：“就在那里。”

“哦！那我們今天从你家門前經過的。”

接着他又問我家里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样等等。我們談起家常来了，慢慢的，我不象开始時間一句答一句的那樣拘束了，他是那么亲切，心里不由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別的好感，于是就把家庭的情况全部給他讲了。

等我讲完，他在会场四面看了看，原来，場上还有有些人也在东一个西一个的和宣传队员們亲切地交談着。

他把手招了招，叫大家围攏来，接着，他又向我们几十个人讲开了：“乡亲们！我们都是穷苦人，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豪绅……，你们想想看，一个村上只有一两个地主，大家团结起来还怕斗不倒他们吗？……乡亲们！要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他的话象一根火柴点着了干草一样燃起了我们胸中斗争的火焰，我们这些年轻的穷后生们，不由得活跃起来了。

以后，宣传队又下来了两次，每次我们总有许多人去和他们贴标语、发传单，或者帮着搬东西，布置会场。穷苦的农民在红军的宣传和教育下，都慢慢开始觉醒了。

可是不久，宣传队要回到长汀去了。临走时，他们告诉我们要在村里成立赤卫队，把斗争坚持下去。第一次上台讲话的那位同志（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还特地给我留下了一张条子说：将来红十二军离开后，如果万一情况紧急，就到长汀县十字街陈诚中学找红十二军的招兵委员会去。

我们根据他的指示，马上成立了赤卫队，队员们都是村上一些不怕惹祸的穷小伙子。大概因为我年龄稍微大一点吧，大家就推我当了队长，其实，我们都是初出茅庐，怎样组织领导，谁也不清楚，反正只知道要团结起来跟地主老财们干！赤卫队都集中住在村上地主的房子里。我

們戴着紅袖章，拿着梭標、大刀、長矛、土槍等，學習宣傳隊的做法，每天出去開大會，把沒收來的東西分給農民，鬧得轟轟烈烈，鬥爭一天天向外擴大。

1932年春初，紅十二軍從曹坊撤走了。我們赤衛隊一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為了更好的把鬥爭堅持下來，最後確定暫時回到各自的家里去，每天晚上聯繫一次，鬥爭不是那麼大張旗鼓的進行了。

一天早上，天還是黑糊糊的，我睡得正香，突然聽到一陣劈劈啪啪的槍聲和吹得噠噠响的洋號聲，我剛睜開眼，又傳來了刺耳的“沖啊！殺啊！抓活的！”的叫喊。情況不妙，民團来抓人了，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開門！快開門！”空空空空！一陣槍托猛烈的打在門上，糟糕，這怎麼辦呢？我從樓上後牆的木窗里探出頭去一望，昏暗的晨霧中，一些民團象喪家狗一樣在屋子周圍亂轉，可是在緊靠屋後的小山溝里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我靈機一動，迅速拿起一塊磚頭，用力朝木窗砸去，“呸”的一聲，磚頭碎成兩截，木窗一家伙被砸了個大窟窿。我一步跨上窗戶，使勁一蹣，拼命往下跳，越過小溝和溝那邊的高牆，正好跳在牆那邊的山坡上，這時也顧不得兩腳震得麻酥酥的刺痛，就橫沖直撞的急急往上走，一口氣跑到了山腰上的一個小樹叢里隱蔽了起來。

山下不時傳來乒乒乓乓的砸東西的聲音，夾着狗咬

声，民团的喊杀声……乱成了一片。

为了防备敌人的阴谋，白天我还不肯下山，就在稻草堆里躲着。可是心里哪能安得下：我是逃出来了，别的赤卫队员不知有没有危险，村上抓走了哪些人呢？母亲的下落怎样？……一连串的问题撕裂着我的心。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了，我顺着山路，慢慢的往下走，黑漆漆的村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偶然传来几声零落的狗叫。我又翻过一个山梁，急匆匆的摸到了河西马子家。马子也是赤卫队员，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这次事件的经过：原来民团是地主曹兴旺出钱搬来的，民团先包围了我家，村上其他赤卫队员听到风声后来不及通知我都逃掉了，因此也都没有被抓到。母亲因为来不及逃，被民团捆着拖了有三、四里路，鲜血顺着一路淌，后来大概敌人以为她死了，就将她丢在路旁的茅草里，是邻人把她抬回来用姜汤灌醒的。这批狗杂种临走时还在村上大叫大嚷说：“抓不到赤卫队的人不甘心，以后抓到了一定要剥皮、挖心肝、活埋！”

地主和狗腿子们的心多么狠毒啊！但当我知道同志们都没有受到损失，母亲也还活着的时候，心里总算宽慰了许多。

面前的事实告诉我村上是再也不能待下去了，怎么办呢？这时，想起了宣传队那位同志临走时对我讲的话，他留下的那张条子，还藏在我贴肉的衣袋里，对，当红军

去！穷人要翻身，只要拿起枪杆，坚决和地主老财们干到底！

第二天，我决定回家去看看，同时和母亲谈谈当红军的事。一到家，只见屋门敞开着，木板墙被打得稀烂，房子里乱糟糟的，桌子、板凳的断腿东一条西一条，仅有的几个罐子也被打破了，破布烂衫被撕得一片片的甩得到处都是，灶也砸倒了，锅子碗具全都砸碎了；家里稍微好一点的東西被搶劫一空。母亲躺在屋角里的木板床上吃力的哼着。这一幅凄惨的情景，刺痛着我的心，惨痛、愤恨、复仇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我恨不得立刻去参加红军，拿起枪杆，把这批地主老财们狠狠的揍个痛快！

“娘！”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你这冤家，再不回来把我急死了。”母亲睁开眼慢慢从床上坐起来，她叹了一口气说：“哎！这是什么世道啊！”

“娘！不要难过，这口气总有一天要出的！”我愤恨的说，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怎么？还想出去闹吗？”母亲马上问道。

“对，我要去当红军，象宣传队的同志一样，拿枪和他们干！”

“当红军去？……”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泪水已经盈满了眼眶。

在这种：走，舍不得，在家，待不住的情况下，我知道她此时心里一定很难过，因此就没有再说什么。

停了半晌以后，她慢慢转过身来望着我说：“哎，现在这个时候，我也不愿留你！”说完后她又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说：“这批狼心狗肺的畜生，真是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啊！”

“娘，我明天就走！”看着母亲这付样子，我真是又高兴又难过。

“明天走？急什么！”她停了停又说：“等两天吧！让我替你做两套褂裤，好带出去替换。”

“不要！你的伤这样重，怎么能缝呢？”

“怕什么，只要他们砸不烂我的老骨头，怎么不能做？”

我不愿意辜负母亲的一片好心，于是就答应了。

那几天，母亲白天黑日的忙着。我一面收拾着家里打得一塌糊涂的破破烂烂，一面出去和赤卫队员们联系，商量着一起参加红军。

早春的夜，还是有点凉飕飕的，母亲在松明下（用松树枝点着发出的光亮）一针一针的为我缝补着衣服鞋袜，看她支着创痛的身体，我实在不忍心让她过度的劳累：“娘，快睡吧，你身体吃不消的！”

“一夜不睡几更天，一世不睡几十年，有什么要紧，

“哎！这次縫了不知以后什么时候再替你縫呵！”她总是这样說。

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要怎样，你是不大容易更改她的主意的。我只有坐在她的身旁，和她拉拉，有时就給她倒上一杯热茶。在一晃一晃的松明下我端詳着母亲慈祥厚实的脸，啊！我发现她的脸颊消瘦了，鬓边出現了几根花白的头发，生活的风霜，使她刚过四十的年紀，就显得格外蒼老了，我不禁心里一陣难过，革命的決心更是坚定了。

三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背上母亲亲手打的小包袱，和本村另外四个人，拿着宣传队那位同志临走时留下的条子，奔向长汀县去。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草地上見到毛主席

刘 崑

工农紅軍北上抗日，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鎖，1935年秋天已到达川、甘边境，进入草地。

草地，遍地野草，远远望去，无边无际，昏昏沉沉，象是茫茫的海洋。野草都有一人多高，地上还积着三四寸深的黑水，在这人迹罕到的地方，紅軍战士深一脚浅一脚的探索着前进，一天最多只能走四五十里。一天中午，发现部队行进前方有一片原始森林。首长們考虑大家在草地这些天确实很辛苦，就决定当晚宿营在这片森林里。我們这伙青年人，一听說要宿营，心里真高兴，每个人都为自己寻找一张富有弹性的“落叶床”^(注)，躺下休息。

那时，我在紅軍大学四連任副班长。长征中，上级虽沒有說明，但我們早就发现紅大是在保护着党中央前进。我一路上常想，这么長時間了，怎么沒有見到毛主席呢？

注：用碎草和树叶堆起来的床鋪。

在江西时，我在中央总医院当看护，经常看见毛主席来看望伤病员；长征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进入了草地，惦记毛主席的心思更是常常在脑子里打转：这样成天翻山越岭，道道关口打仗，毛主席到底怎样了？他还象在江西时那样健康吗？

第二天早上，部队要烧水烧饭，我便带着全班出去打柴了。

清晨，空气格外清爽，从云端里透出的阳光，照得草地通亮、金黄。森林里虽然看不到直射的太阳，但在浓密的树叶空隙处仍然有隐隐约约的亮光。古木丛生的树林里，每个角落都有拾柴的红军战士，大家说说笑笑，真是热闹。

拾着拾着，我挺起腰来舒一口气，突然，发现在近处人群里有一个和我穿着一样灰色旧军装，头戴灰帽的同志，他也在一枝一枝地拣着柴火。我心里一亮，惊喜地脱口说了一声：“呵！毛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班里的同志都围过来，顺着我的视线看去。

“就是呵！毛主席比在江西时瘦了。”

“毛主席怎么也和我們一样出来打柴火？”

“不要让毛主席打了，我們多打些就行了，晚上請毛主席和我們一起烤火。”

班里的同志們都深受感動，小聲議論着。也許毛主席聽見了我們的談話，抬起頭來和藹的看看我們，向我們笑了笑，又回過頭去看看其他拾柴的同志；而後，又彎下腰繼續拾柴。這下我看得更真切了，毛主席還和過去一樣慈祥可親，和過去一樣有精神。心裡一樂，回頭對同志們說：“繼續干吧！毛主席身體很好。”

當我們目送毛主席挾着一捆柴火回去，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消失在樹林里以後，我們不禁懊悔起來了：為什麼沒有上去和毛主席說說話呢！

夜里，森林中生起一堆堆篝火，火的四周都圍滿了人。對着閃爍的火光，我沉思起來：是哪一堆篝火，有毛主席親手打的柴在燃燒？是哪一堆篝火，毛主席正在它旁邊取暖，思考着全軍的大事呢？

深夜，我躺在“床”上，興奮的小聲說：親愛的毛主席啊！我要永遠跟着您！